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一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二期 ——
(二〇一一年一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1b)

【研究报告】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下）	唐少杰
【读史札记】	读《军人永胜》兼谈黄永胜之倒台及相关军史人物	司马清扬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下）

• 唐少杰 •

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无非是他们主要集中在下列十多个方面表现出的不满和指责：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作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等。（24）这些不满和指责在当时无疑是深切和尖锐的，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即使在文革“教育革命”的兴盛时期，清华大学都有一股根深蒂固的批评、怀疑和动摇文革以及“教育革命”的心态在潜行。例如，正是分管“教育革命”工作的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强调：“对教育阵地十七年不能全面否定，”“工农兵学员质量像面包，看起来鼓鼓的，一捏就瘪，像这样，我们民族文化要毁灭了。”他被称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在党内的代言人、“保护伞”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急先锋”，他和清华一批干部由于自己的公正观察和客观评论而受到批判和免职。

1975年底，清华“教育革命”的偏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华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教学改革改得怎么样？所承担

的工厂任务完成得怎么样？”〔25〕到了1976年，他们继续强调，“现有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从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来看，从他们的世界观来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来看，大多数还是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6〕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直到今天，我国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大多数知识分子距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一遇到风浪就会左右摇摆。极少数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遇到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这一次的右倾翻案，都是从知识分子成推的上层建筑领域首先发难，就是一个明证。”〔27〕

总之，清华“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上了大学，即使学的技术能上月球，而人的思想却趴下了，这样的教育再‘高’，也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28〕迟群典型地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29〕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二

清华“教育革命”的模式除了上述的政治方面，还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

清华“教育革命”在招生对象问题上，鉴于文革前招生以考试为标准所带来的“智育第一”和学生中工农子弟比例一直不高的“教训”，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过去清华招生中由于家庭出身及父母职业的影响等因素，使得非工农子弟（如知识分子、职员和干部等子弟）入学比例相对较高，而工农子弟比例相对较低，据统计，“1961年到1965年，清华新生中的工农子女的平均比例占新生总数的42%（1961年为40%，1962年为32%，1963年为37%，1964年为51.8%，1965年为49.3%），比当时全国平均比例还低20%。”〔30〕这些成为清华文革前的教育的一条“罪状”。清华“教育革命”把改变招生方式、改变学生成分当作一项基本的内容。

从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收大学生，这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闻。算上文革前招收并在文革期间毕业或结业的大学生，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培养至少有七年或七届学生陷于“非正常学习”的时期，例如，1965年进校的大学生只有近一年的学习时间。随着“教育革命”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如何办学及怎样招生的问题就摆在了大学的面前。

1969年3月至8月，清华在校内外举办了22个教育革命试验班，招收400余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教改探索。清华还听取了钱伟长等老教授关于教学改革设想。1969年8月底9月初，清华2894名师生分赴校外24个对口单位进行劳动，“探索”“教育革命”。1968年12月至1969年8月，由工宣队队员、教工、学生组成的19个教育革命小组，先后到几十个工厂、公社、部队及部分院校、机关，召开了近200次讨论会，听取对大学招生等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日后实行“教育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最主要的就是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确定了：“一、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招生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分子。从工农兵中招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挑选政治思想好，具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优秀分子入学。二、招生和分配要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三、关于文化程度。……今后大学从工人中招生，文化程度不宜限制，既有文化低、但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培养前途的老工人，又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三、四年级实践经验的青年工人、农民。四、学生年龄以20—35岁为宜。五、招生办法。

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群众路线，学习解放军征兵办法，采取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与选拔相结合。”（31）在稍后的几个月里，清华继续派出许多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等进行教改试点工作。到1969年底，在清华校内外试点班招收了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513人，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17岁，多数是25—35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以初中程度居多。选拔和培养采取单位推荐，结业后“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学习最短的两个月，最长的两年。（32）这样，到1969年夏天，清华“教育革命”的招生方案实际上已经形成，同年底，这套方案的试验经验已经定型，一年后推向全国。

1970年3月，北大、清华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33）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1970—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1970年，清华大学共招收各类学员2842名，均系推荐入学，未经考试，文化程度严重不齐：小学258名（占总数9.1%），初中1935名（占68.1%），高中533名（占18.5%），中专109名（占3.8%），上过大学的7名（占0.2%）；（34）实践经验有10年以上的有609人，4—9年的有1092人，3年的有321人，3年以下的有820人；学生来源为老工人596人，青年工人794人，农村青年1008人，现役军人444人。（35）在1972年招收的2072名学员中，高中一年级以上水平者占23.2%，初中二、三年级水平者占53.3%，初中一年级水平者21.5%，中等技校和其他水平者占1.9%。这一届的学员学历要稍好于70届的学员，前者的初中学历者（包括未完成的）约占74.9%，而后者实际毕业的2805名学员中，初中（包括未完成的）及初中以下的学历者就有2162人，约占76.7%。（36）这是因为1972年，在不少省市工农兵学员的选拔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文化知识考试，后来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取消了所有考试。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最初为三年半，1975年改为三年。“三年半教学过程大体安排是：学员入学后，首先参加专业生产的全过程，同时参加工厂的技术革新，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基本知识；然后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结合一个或几个典型的生产、科研任务，边实践边学习，同时紧密联系实际，安排一定的理论提高阶段。”“现在工农兵学员培养的整个过程，始终坚持开门办学，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学习。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直接参加推翻剥削者的斗争，直接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单纯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组织教学的旧传统。”在反驳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学生在学习期间主要是学习书本知识后，强调这种陷于书本的作法就是使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修正主义道路。……结合各种典型任务，边实践边学习，这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培养学员的一个基本的、有效的过程。结合典型进行教学，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教学环节。它的目的是通过完成典型任务，学习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立场感情和革命精神，培养学员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典型的选择，应该是生产科研的实际任务、有利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能体现专业的培养要求。”（37）

1971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的“工农兵学员”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三年制）（38）

课 程	汽车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房建专业	
	学 时	%	学 时	%	学 时	%
毛泽东思想课	1 3 5 4	2 0	1 4 0 0	2 0	1 2 1 8	2 0
学军课	3 3 8	5	3 5 0	5	2 8 8	5
学农课	3 3 8	5	3 5 0	5	1 9 2	3
学工课	2 3 7 8	3 5	2 6 0 0	3 8	1 9 8	4
基础课（包括专业基础）	9 6 0	1 4	7 5 0	1 1	1 1 4 0	1 8
专业课	1 4 0 0	2 1	1 4 5 0	2 0	3 1 0 0	5 0
总 计	6 7 6 8		6 9 0 0		6 1 3 6	

清华大学在1972年规定，切实保证学员在每学年39周中有81%的业务学习时间。（39）林彪事件前后，针对“有些班级一度学习纪律松松垮垮，教学进度完不成，业务学习时间无保证，甚至有的班第一学年教学时间只占总学时的56%”这一情况，清华取消了一些空头的“政治学习”，决心保证教学总学时中75%到80%的时间用以业务学习。（40）稍后，还一再强调应使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时间应占每个学年学时的70—75%，但是事实上只能保证50%左右，因为大部分学时还是被入学教育、政治报告、政治讨论、大批判会、排练庆祝活动、野营拉练、挖防空洞、挖坑栽树、挖河清泥、清理仓库、迎接外宾、看内部电影等等所占用。（41）自动化系学员反映，入学9个月，理论教学只有52天。汽车系的学员反映，在校期间，真正学文、学工的时间不到五个月。（42）又如，1975年5月5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学员每周活动时间安排的通知，规定除每周星期二下午政治学习外，每周政治课时间为四小时，星期四晚上党团活动，星期五晚上机动，可安排讨论“教育革命”、班务会等，星期日晚上为业余读马列著作小组活动时间。（43）这样，在一周七天21个单元时间（每一单元约4个小时）中，至少有5个单元时间为非专业学习时间。学校也承认，由于教学总学时减少了50%、教学内容减少了40%，遇到了教师的一些不满和批评，甚至如何看待教学质量成为教育斗争的一个焦点，成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凭借他们在‘文化’上某些传统的优势，以‘文化’业务这条大棒，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教学质量、文化考查、知识分子的思想反复……等问题上的斗争，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在教育阵地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还要在这个领域，利用他们某些文化的优势，反对无产阶级的占领。”（44）在“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就是最大的业务”的支配下，学时能否得到保证，还取决于学校是否进行政治运动等活动。例如，在1975年底至1976年，学员的学时就被铺天盖地的“批邓”运动占用了许许多多。反正，工农兵学员的学时最难以得到保障，也最容易被打发掉。

清华“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力量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业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无法依赖教师，但是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而另起炉灶，现实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去培训学员。因而，清华“教育革命”中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不过，以1970年招生为界线，清华“教育革命”对待教师的作法还是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工宣队刚进入清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广大教师处在一种无形而又深重的恐怖和压抑之中。除了进行前面所提及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宣队还把广大教师下放“改造”。1969年5月，清华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1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45）同年5月至10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2821名

教职工（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7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10月来的一批人带有战备疏散的特点）。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工患有血吸虫病。这个农场与清华本校相距千里，主要是用于教师的劳动改造；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农场本身几乎接触不到农民；自称是自给自足，但是来往的人员车费开销巨大，从事农活的花费巨大，生产出的稻米每斤成本不低于当时人民币1元（那时全国各地的稻米每斤销售价格一般不超过2角）。到了1970年，农场劳动改造和校内教学任务，两边都“争夺”教师。最终，这个农场所造成的沉重负担使清华无法继续承受下去，1971年10月后不得不迁移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

1969年底，清华大学近万名师生员工（包括1964年和1965年入学的学生3270人）主要分布在四大方面：在校内有3515人，在江西农场有2122人，在四川绵阳有624人，在三门峡、丹江口、邯郸、张家口等地进行“教育革命”的有2320人。（46）造成清华这种分散的局面，除了“教育革命”的因素影响外，还有当时备战形势的作用。这时的清华经历了继自己的“西南联合大学”历史之后的最大一次“分化”。

1970年招生后，教师们陆续回到清华，但是，他们的政治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教师们从事教学，他们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后面，还要提及这一点。“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于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们，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47）进而，工宣队更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典”之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48）

“教育革命”一再给教师的重压使得一些新教师力图向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看齐，他们不想接受教师的身份和称号。例如，1970年夏天，文革前招收的清华在校大学生全部毕业或结业，873名毕业生留校工作，其中不到一半人从事教学和科研，其余的从事工厂、后勤、机关等工作。为了表示与旧教育的“决裂”和与工人阶级“划等号”，他们自称为“新工人”而放弃“教师”的称号。另一方面，在“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影响下，清华一些老教授试图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改换成对“教育革命”的某种适应，工宣队对此概述为：他们从“业务名词不离口，到红宝书不离手；从故纸堆里钻出来，到大批判战场上杀上去；从‘神仙会’养尊处优，到‘学习班’斗私批修；从消极等待‘斗、批、休’，到积极投入斗、批、改。”（49）这往往是这些教授的异化式的表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文革“教育革命”都是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难史和精神炼狱史。

在如何办学的问题上，清华“教育革命”做出了非同小可、波及全国的举措。清华“教育革命”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演变成为整治知识分子、冲击教学并使教育裂解而蜕化的“大棒”。

1969年8月，清华确定建立汽车制造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以厂带系甚至以厂取代系和专业来进行办学。1969年10月，为了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工宣队决定，在清华汽车厂生产纪念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七·二七”牌3点5吨中（小）型军用载重汽车。这种作法只不过是把文革前清华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政策推向极端，力图把清华变为生产与教学并重（几乎谈不上科研）的单位。工宣队以汽车系、机械系等系为汽车厂的主干，提出“以厂带专业”，调动汽车、铸造、锻压、焊接、金属热处理五个专业的全部力量，来进行汽车生产及教学。与此相关的大部分教师乃至全部学员都成为该厂的“工人”，办厂不久，有的学员就抱怨“我们是廉价劳动力。”汽车厂群众批评学校在办厂问题上有“贪大求洋”

的倾向。(50)原计划是该厂1970年上马,1971年生产500辆,1972年生产1000辆,最后只生产了50余辆,生产出来的汽车实际上主要是依靠外面的汽车厂提供大部分零配件加以组装的。这种“七·二七”牌汽车不仅质量低劣,而且为了它的生产,调动全校各系各专业的人力和物力,使全校的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生产都受到影响,仅在人力上就调动了上千名的教学、科研、技术、工人和学员等人员,所建起的汽车厂占用了相当大的实验室、车间和教学区的用地。有的实验室遭到强行改行,损失巨大,三年难于恢复元气。(51)清华汽车厂的上马和下马所造成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浪费,是对“教育革命”办学办厂的最有力的佐证。当时,偌大的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人对这种办学办厂进行了一针见血、有理有据的公开批评,他就是在机械系一车间以“待罪之身”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52)

这种“以厂带专业”的办学方针,使得非汽车专业的电力学、建筑学、土木工程学、自动化控制、数学、力学、热能学、水利水力学、电子学、工程物理学(即原子能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化学等专业遇到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有的清华工科和理科是否就意味着一定办成工厂或走出校门“办教学基地”?是的,例如,土木建筑系四连就提出:“土建系必须到工地上去办”。(53)不难确定,这种办学必定是以牺牲或削弱理论教学(特别是基础理论教学)为代价的。这种办学在清华还对作为理论教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实验室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清华的实验设备普遍落后,大体上是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30年代水平的实验设备。(54)到1974年,全校58个实验室,除6个较好外都受到损害,有21个需要完全重建。清华科研人员也由文革前占教师人数的30%下降到10%。(55)即使在文革结束之际,清华全校的实验室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清华“教育革命”的办学方式不仅在于上述的以办厂来代替教学,还在于使学员走出教室和实验室,作为直接的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这种“开门办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首先是使学生向“工农思想开门,”(56)从而保证学员学习的所谓政治质量、路线质量。清华“教育革命”一再强调,“开门办学”关系到学校培养“什么人?”和学生“为什么人?”和“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清华文革前五年制或六年制的大学生没有解决,而通过“开门办学”,文革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解决了。

“开门办学”的方式还表现在抛弃清华过去通行的“老三段”教学程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提出“教师启发做向导,书本理论做参考,生产实践是基础,课堂总结再提高。”(57)这无疑是把生产劳动看作先于教学并且高于教学。在生产劳动中实行教学,这种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是无法保证和无法提高的。这种否定和放弃“老三段”教学的做法,受到许多教师的批评,为此,工宣队再三强调,批判和破除“老三段”论,是清华“教育革命”的关键。“打破‘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旧框框,紧密联系专业生产实践,把原来的基础课与专业课结合起来,重新组织教学内容,许多专业都结合典型任务,正在逐步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过去单纯按学科设课,了解一幢房屋的建造,要学十几门课。现在房建专业针对一幢房屋建造需要的知识,建立了一门新的课程《房屋建筑基础》,包括了力学、数学、结构、建筑材料、施工等内容,有理论有实际。”力图使课程“少而精”。(58)1974年初,为了回击去年所谓“旧教育路线回潮”,工宣队决定,清华在校的几届学生全部走出校门,进行“开门办学”。同年初春进校的新学员,刚入学就让他们出去“开门办学”一年,致使他们上业务课的时间大大缩短,只占总学时数的45%,有的专业只占20%。同年批林批孔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清华“教育革命”使自己下列“开门办学”的经验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强化:“到工农兵中去,开门办学”、“建立工人讲师团,广大工农兵直接管教育”、“校办工厂工人广泛参加教育革命”、“多种形式办学,为工农兵送学上门”、“学员在实践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理论总结提高”、“工人参加科学研究,结合教学开门搞科研”、“知识分子在工农兵中加速世界观改造”等等。(59)

与此同时，“开门办学”的教学必然要打破和清除清华过去教学中的“三中心”论，即“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带来了一种名为教学为生产劳动服务、实为以“教育革命”的政治为中心的相当混乱、破绽百出的教学秩序。例如，基础课教学原是全校统一负责，改为基础课下放到每一系甚至每一个班，即每一系都有几乎“门类齐全”的数学、物理、政治课以及有关基础课的教师。教师们被分散、被编入到不同的学员班级，同一学员班级由学科不同的教师混合组成“业务组”，如同火车的“包乘组”，把学员由入校带到毕业。1970年之后，清华逐渐恢复了部分教研组，但在1973年底之后，又把教师与学生按照专业合在一起，建立党政合一的工宣队队员、教师、学生三结合的专业领导小组。在教学上由几个教师负责一个班，承担由基础课到专业课的全部教学任务，甚至原有的系一级的基础课教师也被“下放”到各个班级，在教学上实行“三自一包”即自己编写讲义、自己刻印讲义、自己讲授讲义，各门课程包干负责，教师的教学“单干”现象严重，教师忙得无所适从。还有一些教师所学非所教或者所教非所学，例如，原有的一大批基础课教学（例如，电工学、热力学、工业电子学、画法几何、工程画图、机械零件等）是为全校开设的，但这时却集中在某些系或教研室甚至班级里，其他单位要开设这些课程就得另找教员，改行开课。教学秩序和教学局面的混乱引起了许多学员和教师的不满，他们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把基础课教师分配到连队（即系、班级）的“连队所有制”作法，因为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60）实质上，这种根据学员班级而不是根据学科来进行教员讲课和教学分工的作法，如同从协作明确、效率优先的工业经济倒退到包田到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清华“教育革命”也在教学方法上做出了与上述方面相适应的变革。按照《创办》所说的，“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学边干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这又是弥天大谎，因为在《创办》写作的1970年初，清华大学还没有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是招收了几类不同的为时几个月到近一年的短训班进修学生，拿这种培养短训班的经验来侈谈什么大学本科的教学，与其说是以偏概全，不如说是以观念的强制先行来杜撰后来的教学模式。因而，这就不难理解“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61）这实际上就使基础课和专业课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使教师无所适从或难于适应，而且使学员所学到的东西或是非系统的甚至非理论的经验之谈，或是急功近利、穷于应付的手工技艺。

清华“教育革命”所倡导的教学方式还有教师、学员、工人（有时为工宣队队员）三方一起进行的“三结合备课方式”，这一般是由教师先写出教学规划，由学员班级支部或代表讨论、由工人“把关”后方可由教师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实际上，这种教学完全是以教师被动、学员任意改动和工人随意决定的形式来进行，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即使是清华“教育革命”的一份经验材料中也批评了有些学员上课时对教师一不满意就当场批判教师，“无限上纲，不是耐心地帮助他们，使一些教师感到压力很大，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有的甚至不愿意在教学第一线工作，认为谁上讲台谁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谁在台下谁就当革命的动力。”（62）在这“教育革命”的年月里，清华还多次发生过教师按照大学的水平讲课，却因学历低、知识浅的工农兵学员听不懂，教师被哄下讲台的事情。例如，40年代出任过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的一级教授陶葆楷（1906—1992）就曾在讲课中，因为学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而听不懂，受到斥责和当场批判。（63）

清华“教育革命”把编写与过去不同的教材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不同不是从教材的学理方面而是由教材的政治价值来确定的。因此，“各门课程都要贯穿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要向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盘踞的学科体系发动进攻。在这个基础上大打教材之仗。课程和教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各级领导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要把改革旧的课程、编写新教材作为一场阶级斗争的战斗来进行。每门课程都要查一查，还有哪些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还有哪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诸如‘猪尾巴的功能’之类的东西？要发动群众，到工农兵中去，开门编教材。”〔64〕这种在教材编写上的“革命”就是推翻和抛弃文革前所用的一切教材，要按照“开门办学”等“教育革命”的方式来编写新教材。对于许多课程，新教材的编写都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写出的教材不是在讲课的前夕才发出的“传单式的”东西，就是在课堂上可以任意放弃、随时改换的“玩物”。今天看来，这种新教材往往是充满了政治口号加上实用性的个别事例的低俗之作，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教学或学术或学理的价值，而只有某种历史文物价值。更为荒唐的是，这种新教材的编写大都是由教师写出初稿而由学员和工宣队队员“审定”的准政治性教学任务，仿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编写教材的过程也就是政治建人的过程。”〔65〕即使在“教育革命”推行了数年之后，清华教务部门都承认教材编写工作落后和水平不高。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给予清华“教育革命”带来直接挑战的还不是办学方式及教学结果等，而恰恰是清华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也是清华“教育革命”的总体性的政治危机。众所周知，1975年8月和10月，由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指责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清华引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并于次年初引发了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一时间，清华又一次成为文革政治台风的风源，现有的教学等工作被打乱，“教育革命”急剧地聚集于上达天庭、下通八方的政治斗争的转换和普及之中。清华园内，铺天盖地的数以万计的大字报，成百上千次的大批判会、揭发对证会、经验介绍会、座谈会、誓师会等等，成为日常工作的主流。从1975年11月到次年9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国各行各业约计有近30万人先后来清华大学“参观学习”，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的使节、记者等也来清华参观“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1975年底到1976年初，围绕着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显而易见只是一方的大批判），清华在接待宣传提纲中指出，分歧在于：一、如何估计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二、如何估计文革以来特别是“七·二七事件”后的教育路线？三、当前教育路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四、学校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五、如何看待文革教育战线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六、学校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和坚持什么样的培养学生的标准？七、要不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八、教育界由谁来领导？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能不能领导？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在文革的战车上，清华“教育革命”的政治功能总是过度超负荷地满载。

1976年3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有关常委及有关人员约8人，事先得到授意并经过排练，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批判邓小平的会议，〔66〕他们直面斥责、声讨邓小平的种种所谓“错误”，开创了基层党组织人员直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围攻中央领导人的“先例”。他们回到清华后，又把这一事例传达、介绍给广大师生群众，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波助澜。

文革的两次整顿（1972年周恩来的整顿和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导致了文革中的“反复旧”、“反回潮”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仅教育界处于主要的、中心的战场，而且清华大学始终处于这种战场的前沿，甚至是使“教育革命”一再兴师动众、呼风唤雨的制高点。这再一次显现出清华“教育革命”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说，由清华大学成为源头的上述批邓运动是文革的最后一场运动，标志着文革走向穷途末路，那么同样由

清华大学掀起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丧钟，并且最终致使文革“教育革命”走向了不归之路。

三

清华“教育革命”乃至整个文革“教育革命”的重心，不断超出教育领域，几乎失去了教育的本意，成为泛政治化的东西，成为文革政治斗争的仆从或工具。这类革命对于教育界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异化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由外来者所强加和所主导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教育的鄙视和对于教育者的歧视，如同当时清华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67）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文革从教育界开场，又在教育界落下帷幕。教育界，具体地说，大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文革的摇篮和坟墓的“结合部”，成为文革罪过和灾难的渊薮，成为“教育革命”的“标本”，无疑，这些都具有值得后人不断加以审视和借鉴的某些人文因素。

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对待“教育革命”则意味着如何对待文革，反过来说，亦然。进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同样反过来说，亦然。但是，“教育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这种失败的必然性来自它自身不可化解的两个主要“内因”。

首先，“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68）的确，为时八年之久（1969年至1976年）的“教育革命”所带来的问题是特别需要我们深切反思和痛切批判的，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国内评论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这种实质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69）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显而易见，“教育革命”带来的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知识和反知识分子运动，也不是凸现或褒扬农民大众的文化价值，更不是什么倡导全民教育上的平均价值和均等状态，而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人格的大蜕化。下面仅用清华“教育革命”的事例来说明。

1972年9—10月，清华校级领导人先后分头到各个系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发现学员的文化知识程度和年龄严重不齐，例如，水利系水工专业二年级68人中，工人、农民学员各占30人，解放军学员占8人；初中程度55人，占80%（其中初中毕业的38人），高中毕业6人，小学程度6人。学员入学时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7人，25—30岁的5人，25岁以下的56人。二是发现学员的学习水平实在差强人意，据统计，全校平均学习好的学员一般只占全部学员的20%左右。例如，机床专业二年级有四个班共92人，学习好的只占22%，学习中等的占55%，学习差的占23%；其中第四班是由分出来的困难学员组成。三是发现学员中具有难于想象的学习困难和无法克服的学习障碍，即有的学员不会做作业，只能抄袭别人的；有的学员在数学方面还没有达到初等数学的水平，数学必须从复数、四则运算、三角函数等补起；有的学员不懂原子结构等基本概念，分不清克分子浓度、百分比浓度等；有的学员在函数、对数和指数的运算中频频出错，连计算尺也运用不习惯、不熟练，常在单位换算、小数点定位上搞错。四是发现基础课往往冲掉了专业课，课程学习中没有循序渐进，几乎没有严

格可行的标准。(7 0) 清华当时的校方总结材料中也承认, 在教学中遇到了学员文化程度严重不齐的尖锐矛盾, 学员最高的程度达到了中专水平, 学过微积分, 而低的连加减乘除运算都很困难。学员学习中遇到了“吃不饱”与“吃不消”的抵触。(7 1) 清华还把机械系的一些学员之间经过从四则运算到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的“提高”, 作为“互教互学”的经验加以介绍。(7 2) 更为可笑的是, 有的学员不仅基本概念不清, 而且就没有基本概念, 一位学员就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 为此还与教师争论了半天。(7 3) 有的学员甚至连书信也写不了。

学员们也对“教育革命”的无序和混乱表示了不满。他们批评清华校、系的许多领导人的工作作风, 认为他们就习惯听汇报、看简报和发指示, 凭借着第三、第四手的资料进行一般号召, 胸中无全局, 手中无典型, 很少深入群众和深入实际, 虚饰、浮夸严重, 形式主义的东西颇多, 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东西不少, 工作头绪繁多, 抓不住重点, 搞什么工作都是虎头蛇尾, 最拿手的就是一号召, 二发动群众, 三大批判, 四大总结, 这完全是一套八股, 对于解决实际矛盾无济于事。(7 4) 除了前面提到的批评教学时间没有保证外, 他们还对学生安排、所谓“以干代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方式等提出了意见, 尤其是对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有些教材编得还不如文革前的教材好懂。这些意见主要如下: 数学教材从小数点运算到微分方程要一年内学完, 有些学员被“灌得够呛”; 有些教材是上来一段毛主席语录, 下面还是文革前的老一套; 在干中学遇到的问题, 无法解决, 因为理论基础不够; 对实验室教学重视不够; 学员的自学条件差; 老师不敢在课后或者课下给学员进行辅导, 害怕被指责为犯方向错误; 等等。(7 5) 更为荒唐的是, 由于学员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 同一个专业班级的学员往往迫不得已被分开来上课, 即在同一个上课时间, 有的学员补习中、小学的知识, 而有的学员在学习大学的知识。这种同级同专业同班学员分班上课的作法, 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另一种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因材施教”, 是分裂工农兵学员, 提出“还我战友”。有的学员反映, 教学只能吃“份饭”, 有吃不了的, 有不够吃的, 不够吃的只好去找“野草”, 弄不好还得“中毒”。机床厂的学员提出, “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 也不让一个阶级弟兄停步不前。”这也不过是口号而已。(7 6) 可以想象, 即使同一个班级所有学员都上同一门专业课, 学员们在学习上的差异更显著, 后果更难堪。另外, 外语课对于学员是可以免修的, 不少学员没有学过外语, 连外语字母都不认得; 还有许多学员不具备起码的外语拼写、阅读和语法知识; 这些使得外语教师无法给他们开课。很多学员事后非常后悔在清华期间没有学习外语或者学好外语。

整个文革期间, 清华大学出国人数总共为 1 2 人次, 其中只有一人赴法国短期进修, 其余都是短暂访问。清华大学在这 1 0 年里没有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清华大学在这 1 0 年里不但与世界先进的大学教育的交流几乎无从谈起, 而且与世界一流的大学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教学和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要诘问的是, 难道“教育革命”需要的正是远远低于大学水平的东西吗? 对此, 邓小平做出了非常中肯的定位。1 9 7 7 年 8 月 4 日, 邓小平在召开 3 0 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参加的座谈会上, 清华一位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 只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半年一年, 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 三年就毕业了。邓小平插话说, 那就应当称为清华中学、清华小学。(7 7) “教育革命”使得清华大学蜕变为清华中学或清华小学, 这是“教育革命”的“平均奇迹”, 还是“教育革命”的蒙昧标记?

清华大学文革中历届招生人数 (7 8)

年 度	入学年月	招生人数	其中: 普通班	进修班
1 9 7 0 年	1 9 7 0 年 8 月	2 8 4 2	2 2 3 6	6 0 6

1 9 7 2 年	1 9 7 2 年 5 月	2 0 9 1	1 8 1 7	2 7 4
1 9 7 3 年	1 9 7 3 年 9 月	1 9 6 8	1 8 4 6	1 2 2
1 9 7 4 年	1 9 7 4 年 9 月	3 4 9 2	3 3 6 7	1 2 5
1 9 7 5 年	1 9 7 5 年 1 0 月	3 6 4 4	3 2 1 8	4 2 6
1 9 7 6 年	1 9 7 7 年 2 月	2 9 5 8	2 3 8 0	5 7 8
总 计		1 6 9 9 5	1 4 8 6 4	2 1 3 1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及进修生的人数，居于全国各大学之首。1 9 7 0 年，清华和北大率先在全国招生，为全国其他大学招生提供经验。1 9 7 1 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大学开始逐渐恢复招生，而这一年清华没有招生。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他们的学习质量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文革之际，就有对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学习水平的很多指责和讽刺，例如，“你们初中毕业，念了三年半，就叫大学生？最多是个中专生。”“（每月工资）5 6 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 9 元就是工农兵大学生。”（7 9）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部门下达规定，把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定为大专。这就意味着“教育革命”所“培养”出来的大学学员没有达到大学本科程度。同时，这还意味着文革不仅没有使大学教育达到本科水平，而且根本谈不上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尽管清华1 9 7 3 年出现过以数十名留校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三个研究班（固体物理、激光、化学），但是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完全陷于停滞。文革给清华在内的全国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留下了1 0 年之久的空白。

其次，“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

“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作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后门”上大学的现象，即一些学员通过职位关系或利用特权关系来不正当地获取上大学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 2 %，个别班级高达约2 0 %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对此，中共中央1 9 7 2 年5 月1 日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毛泽东批示“同意”发布此通知。该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招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8 0）上大学“走后门”的现象实际上一直没有杜绝。1 9 7 3 年底至1 9 7 4 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初期，由于毛泽东本人的亲自干预，使得试图纠正关系到全国数百万人上大学、参军、招工等“走后门”的作法，中途夭折，不了了之。其实，据后来的材料表明，毛泽东本人也直接把自己身边的有关人员送进了北京大学。（8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走后门’也使‘文化大革命’自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如此史无前例的‘斗私批修’和灵魂净化之后，人们却变得如此‘自私’和言行不一……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8 2）不仅如此，“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似乎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思想“遗传”，它根本不可能把反对和抵制在上大学问题上的封建特权放置最起码的议程上。因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启蒙、近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不管“教育革命”有多么外在的辉煌、表面的激进，都无法掩盖它的黑暗和反动。

清华“教育革命”与整个文革“教育革命”一样，由于试图为了建设文革的理想社会而塑造“新人”，由于以异常偏激的教育举措来试图纠正文革前教育的某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更由于以极端激进、富有空想的教育实践来试图建立“教育乌托邦”，所以具有了至今都没有销声匿迹的某些迷惑、诱惑直至蛊惑的特色。

这里，从清华1975年制定的“教育革命”长远规划初稿中就可窥见一斑。这个规划提出在未来几年里，把清华大学初步建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现代化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提出逐步实现教育经费自给以及粮食、副食自给，“不要国家一分钱”；办学方式有：普通班、短训班、业余大学、分校教育、函授及电视教育；争取每年通过短训班及业余大学培养五万名学员；加强普通班的改革，普通班要认真落实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半工半读，积极进行专业改革；力求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改变重尖端轻一般、重理论轻实际、重设计轻工艺等现象，改变各种专业之间分等级的作法，不断缩小和取消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和取消专业分散的现象，既面向工业，也要为农业服务；培养清华内的工人，使他们半工半读，在若干年内达到或接近大学水平；要扩大教师的工农成分，力争在1985年使工农成分的教师占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30%左右的教师既能讲政治课又能讲业务课，同时使教师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学员一起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半工半读，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教师在五年内应累计有一年以上的劳动时间，“基本掌握本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在一个工种顶班劳动。”〔83〕更有甚者，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华有关写作班子在论及在教育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些文章中，把“教育革命”当成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就应当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致最后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只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同时还是改造整个社会的手段”；因而，结论就是“教育单位同生产单位的分离，是随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将随着脑体分工和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灭”，“至于大学消亡的问题，到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完全做到了‘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独立于生产单位之外的教育单位——大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那是将来的事”，尽管现今大学还是要办的。〔84〕

“教育革命”真可谓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也同样是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破产。“教育革命”以形式上的消除不平均而带来了事实上的绝对不平均，以名义上的革命而带来了实际上的连续不断的人身迫害及冤假错案，致使教育沦丧为政治的附庸并且致使学校沦陷为政治的“角斗场”，全盘地钝化甚至取消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地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先天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后天变态和粗陋，等等，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无法克服的自身异化。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注释：

1.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41页，北京，国防大学，1988。
2.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1967年11月9日，第96期。
3. 参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载《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5.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10，《工宣队、革委会 有关清队、解放干部的情况报告、总结等材料》；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 同上档案。

7.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14，《工宣队、革委会 关于“七·二七”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有关材料》。

8. 同上。

9. 同上。

10.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30，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1969年10月18日，第61期。

11.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12. 同上。

13.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14.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4021，《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15. 同11。

16.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5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17.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42—545页，北京，国防大学，1988。

18. 同11。

19.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9，《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材料》

20.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8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1. 同11。

22.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政，案卷号：049，《政治部 1974年—1977年梁效和校理论组等所写的部分有关路线斗争方面的批判稿件等有关材料》。

23.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3033，《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24.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临核查，案卷号：022，《整党办公室核查组 “文革”中大事件调查报告 1、关于“三个月运动”，2、“三个月运动”中被迫害同志的材料》

25. 同11。

26. 同22。

27. 同上。

28. 秦怀文：《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北京：《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2期。

29.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2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0.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政，案卷号：051，《政治部 清华大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简介（讨论稿）》。

31.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26—6902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1969年1月31日第146期、8月9日第193期、第194期》。

32.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33，《工宣队、革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计划情况汇报等材料》。

33.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0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

- 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34．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35．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0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
- 36．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3033，《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 37．同11。
- 38．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纲要（1949—1985）》（讨论稿），第133页，1987年6月，打印稿。
- 39．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2034，《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一）》。
- 40．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35，《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二）》。
- 41．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 42．同11。
- 43．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5023，《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会革委会下发文件》。
- 44．同11。
- 45．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2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简报〉1969年5月31日第179期》。
- 46．同32。
- 47．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8009，《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1968年11月15日第88期》。
- 48．清华大学《清华战报》编辑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载《清华战报》1973年11月8日，第77期。
- 49．同45。
- 50．同上。
- 51．同上。
- 52．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一个毁灭教育的黑纲领》，载《光明日报》1978年9月20日。
- 53．《清华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委会创办 1970年6月23日创刊号。
- 54．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2024，《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加强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 55．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27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 56．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4024，《迟群、张凤瑞等在华北五省及北京市有关会议上的讲话》。
- 57．同上。
- 58．同11。
- 59．参见《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5期。
- 60．同11。
- 61．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62.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63. 同上。
64. 同11。
65.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30，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1969年11月27日第75期。
66. 参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年》，上卷，第116—13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67.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68.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8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69. 参见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70.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2021，《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常委对各系学员教学质量的调查报告》。
71.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72. 《清华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 1971年1月25日第25期。
73. 同11。
74. 同上。
75. 同上。
76. 同上。
77.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339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78.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纲要（1949—1985）》（讨论稿），第132页，1987年6月，打印稿。
79.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4021，《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80.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700页，北京，国防大学，1988。
81.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57—58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82.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9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3. 同11。
84.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政，案卷号：050，《政治部 有关论因循守旧、翻开历史论教育、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以及进一步深入批邓中做好政治工作等意见》。

~~~~~

**【读史札记】**

读《军人永胜》兼谈黄永胜之倒台及相关军史人物

• 司马清扬 •

黄永胜列林彪死党“四大金刚”之首，本书作者黄正，系黄永胜之三儿子。《军人永胜》一书共分一个序、十一个章节、尾章，附带五个附录。主题部分分为十一个章节，讲述了黄永胜自参加北伐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到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时期血与火的历程。1955年3月，黄永胜出任第一任由中南军区改称的广州军区司令，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军人永胜》一书，又称《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此书虽是前传，也涉及到黄永胜在1968年3月入京后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书中最后黄永胜和其子的对话以及迟泽厚所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更是笔者最感兴趣的地方。本书透露出黄永胜倒台之真正原因，也涉及到不少党史、军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粟裕、刘伯承、聂荣臻、许世友等。

## 一：黄永胜是毛泽东、罗荣桓的人

作者黄正问黄永胜：“谁是你最好的上级？”黄永胜回答说：“如果不算毛泽东，那就是罗帅了。还有一个是陶铸，在广东我们配合很好，我很尊敬他。”（页538—笔者注，以下引用《军人永胜》部分一律只标出页码）林彪在黄永胜看来，是排在毛泽东、罗荣桓之后的。

作为自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黄永胜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他就服，其他人指挥就不行。共产党内最能打仗的也是毛泽东，其他人能打也是毛泽东全局指挥的好。（页541—542）因此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黄永胜从心底里对毛泽东和他的革命路线，是抱着崇敬和奉命的决心。（页516）黄永胜说：“毛泽东很欣赏我的。去了北京，一开始他对我很支持，很信任。”（页543）黄永胜这么说，是有充足证据的。

1968年3月，黄永胜被周恩来以“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为名骗到北京，然后被吴法宪直接带到人民大会堂。精神十分萎缩的杨成武在两名军人“陪伴”下被带到黄永胜和周恩来等人的面前，周恩来当众面无表情的宣布“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要好好检讨错误。”并当场宣布杨成武的工作由黄永胜接替。（页513—515）

而在《林彪呈给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示报告》上关于黄永胜的原拟职务是：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则将从“黄永胜任”后面开始到“总参谋长”中间的全部划掉，于是黄永胜直接就任总参谋长。林彪的解释是本意是给黄永胜一段适应时间，如果不行，则回广州。但是由于黄永胜是参加秋收起义过来的，毛泽东信任。于是黄永胜头上没有了“代”字。

黄永胜认为他是毛泽东的人。直到最后，黄永胜仍然说：他这个上将是跟着毛泽东得来的，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走，这条路没走错！这一辈子，他不后悔。（页539）

但是黄永胜知道，前四任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的下场均不太妙，此任职是凶多吉少。黄永胜接到任命后，一肚子烦闷，于是叹道“要是罗帅在就好了，他水平高，关系又好，我们就总有个人可以问一下。罗帅走的太早了……”（页520）黄永胜说：从三湾改编后，罗荣桓就是他的上级，从那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那是二十多年的上级。（页508）黄永胜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罗荣桓对他的谆谆教导，犹如师长般给以他无数关心与爱护。

相比之下，对于也是二十多年的老上级聂荣臻则是另一种看法：黄永胜说他不喜欢聂荣臻。而且有一次黄永胜从延安去东北的路上顺道看望聂荣臻。聂荣臻要求黄永胜留在晋察冀。黄永胜说中央命令他去东北，在那打仗更痛快。这下子，黄永胜一下子把聂荣臻得罪了，就这么一



点小事。(页 5 4 3)

## 二：黄永胜倒台之真正原因辨析

黄永胜倒台的真正原因在笔者看来，是配合了林彪，防止江青插手军队。除此之外，黄永胜多次顶撞江青，更是破坏了毛泽东让江青当常委的意图。于是林彪事件之后，虽然有周恩来的“保票”，可还是很快锒铛入狱。因此，即使黄永胜是毛泽东的人也无济于事，现实政治利益早已经把历史形成的渊源洗涤的荡然无存。

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页 5 9 7) 江青随后多次刁难黄永胜，借黄永胜先批报告后再报送江青而大发脾气。

更让江青难以忍受的是，黄永胜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该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指调动军队），只要写上三个人（毛、林、周）就可以”，从而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再也不像从前一样要经过江青过目。江青因此事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吴法宪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要黄永胜等写出检讨。对于这样无理的要求，周恩来等人竟然也要求黄、吴两人写出检讨。但是林彪支持黄、吴不作检讨。(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页 7 3 1。)

继而，在 1 9 6 8 年 1 1 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 1 月 2 8 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 3 4 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页 5 9 8)

迟泽厚发问道：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引起黄永胜的“警觉”，依然故我。

黄永胜在多个方面继续顶撞江青。而黄永胜认为顶撞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应该坚持原则，不吃江青那一套，好。(页 5 4 0—5 4 1)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连续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笔者注：总共是四次。），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页 5 9 8)

而这前后最重要的一次莫过于黄永胜阻挠江青当常委的事情。九大之前，毛泽东提议黄永胜当常委。黄永胜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我当常委，江青一定要闹着当常委。第二个，黄永胜认为自己资历和能力都不够格。第三个是林彪没有表态，黄永胜明白了其中“水”很深。于是黄永胜坚决而又坚决的辞掉了常委——为了江青也当不上常委。对于一名“秋收起义的弟子”，一名手握兵权的大将，一名地地道道的毛派，应该是最一心一意的紧跟革命路线的自己人，此时却不配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了。(页 5 2 4) 黄永胜又接二连三的和江青对着干，不能不让毛泽东开始怀疑黄永胜的忠心。

而黄永胜最让毛泽东恼火的事情莫过于黄永胜当面同毛泽东谈论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黄永胜说：“张春桥还是个叛徒（笔者注——根据笔者所掌握资料，笔者并不认为张春桥是叛徒。），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页551）八十年代后，黄永胜说：“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坐在江青、张春桥那边更多些。”可这是黄永胜后来的认识，当时在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还不是照样看不清形势。（页543）

黄永胜说：“1970年庐山会议，我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我上山。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我们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彪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最后黄永胜表态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永胜表示：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页550）

黄永胜的这番表态和作为，等于把自己推进了“林彪集团”。一旦毛泽东决定拿掉林彪，那么黄永胜不仅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更是受其职务所累。诸如一样同林彪关系密切的粟裕和苏静等人，就没有受林彪事件影响。黄永胜不行。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这个职务必须拿掉。此时，无论黄永胜原来是谁的人都不重要了，毛泽东要换上自己现在信任的人。虽然黄永胜质疑林彪为什么跑，跑了，就说不清了。在中共当时的斗争模式下，即使林彪不跑，就能说清么？而是根本没有可能去说清，只有无穷的羞辱和检讨。那个时候，黄永胜如果不反戈一击，只能是任毛宰割。能说清，只能寄希望林彪能够活的比毛泽东更长久。

### 三：粟裕

“淮海战役打的那么好，主要是刘伯承的功劳吧？”（黄永胜之子发问——笔者注）

黄永胜回答道：“你还要多看点军史才行。淮海战役是两个野战军合在一起，主要是粟裕提出要打，也是粟裕指挥的。”（页541—542）

黄永胜此说，是否有当时对于邓小平的不满，不得而知。笔者更认为，黄永胜此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开国高级将领的看法和认识。粟裕曾经作为第三野战军的首席代表在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粟裕年谱》，页477。）而元帅的人员名单的考察早于1953年的10月。（刘秉荣，《贺龙全传》，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如果作为一个野战军的代表兼淮海战役的指挥，进入不了元帅候选名单是不可想像的。而事实上，粟裕确实没有被评为元帅，真正的原因却在于饶漱石的倒霉。

黄永胜还说：“元帅里最会打仗的是林彪。”（页541）林彪和粟裕之间的关系在各大论坛上一直是热点。根据孙万国先生的采访，粟裕和陶铸到林彪家是不需要事先“敲门”的。（笔者和孙万国交流）林豆豆则说：林彪虽然很少与人来往，但是他对于他所看得起的所谈得来的人还是愿意与之交谈的，而且一谈就是大半天，粟裕和陶铸就是。林豆豆还说林对粟裕的作战指挥艺术很欣赏，在战争年代就与粟裕电报来往颇多。（官伟勋 《我所知道的叶群》页208）笔者认为这是林豆豆对林粟交往的一个“曲笔”说法。根据笔者的采访，林彪和粟裕的交往在建国后确实较多。这在《粟裕年谱》里面也多有记载。而在“913”之后，粟裕并无对林彪的揭发材料，仅是受命参与过对林彪军事思想的批判。依据粟裕和林彪的交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共同在苏联的一段经历，完全可以大肆揭发一把。在文革结束以后，所谓粟裕揭发林彪是逃兵的说法可以说是完全“照抄”了陈毅的说辞。

#### 四：刘伯承

1995年，迟泽厚曾经因为刘伯承写过一个揭发林彪的材料而致信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迟泽厚对这个材料的看法是：“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1972年3月2日上午，原标题《刘伯承同志揭发林彪罪行谈话记录（摘要）》。许多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四野部队干部，看后反映强烈。刘伯承元帅在军内向以正直厚道著称，我对他极为尊敬。我无法理解，刘伯承元帅虽然已入耄耋之年（时年整80岁），但讲的毕竟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怎能出现这样的谬误？”迟泽厚在致汪荣华的信中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项罪状，竟无一能够成立。”但是由于历来的刘伯承的敦厚形象，迟泽厚说：“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帅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刘帅名义，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四野部队矛盾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迄今为止，迟泽厚仍然没有得到回应。（迟泽厚，《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见《往事》。）

《军人永胜》一书记载了黄永胜的一个回忆：“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做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笔者注：贺龙的调子只能是毛泽东定，其他人都是落井下石罢了。）（页549）

黄永胜的回忆恰恰和迟泽厚的说法对应起来，那就是在中共当时的体制下，每一次打倒一个重量级人物，高层人物每一个人都需要表态，然而表态则是各有不同。精明者如陈毅，在形势尚不明朗之时，就敢给庐山上的彭德怀上眼药，告诉毛泽东：因为只剩下一个陈毅留守，苏联人告诉他可以搞政变了。（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国史札记》，事件篇，页231。）在随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两次跳出来批判彭德怀，并列举若干事实来证明彭德怀是反对毛泽东的。陈毅还自我唾面，检讨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最后宣传林彪作战勇敢，一直很崇敬林彪，表态完全拥护和信任林彪的新领导。（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页531、537）“林彪事件”之后，陈毅再次走上前台，不仅亲笔致信毛泽东，“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还口述录音并亲自修改，劳累至口吐鲜血终未完成。陈毅的表现得到了回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葬礼，称之为“好同志”。

#### 五：黄永胜与专案组

黄永胜说：“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对彭德怀，对贺龙，还有文化大革命，发明权、版权都不是我的。敢把所有人的批示都拿出来吗？”（页549）

黄永胜在1968年3月底代替杨成武主管中央专案组二办。时被看押的黄克诚回忆：杨成武倒台前，专案组对他不仅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克诚休息，有时甚至采取骂、侮辱等手段，发展到极致竟然对黄克诚“武斗”。杨成武倒台之后，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虽然因为个别事件，黄克诚和看守人员发生冲突，甚至两拳相向，但是无论如何比原来好多了。（黄克诚，《黄克诚自述》，页280—282）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张爱萍身上。张爱萍在杨成武倒台之后，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下。仅从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张爱萍就被连续突击审讯15次。张爱萍还回忆说在监禁中受

尽了折磨，除了辱骂之外还要挨打，更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杨成武倒台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张爱萍。而专案组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帽子减少了：日特、叛徒的帽子没有了。（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一两代军人的对话》）

毋庸讳言，黄永胜也写过揭发信。例如黄永胜在当广州军区司令时曾经写道：“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已阅。”（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一两代军人的对话》）黄永胜此信是给了杨成武，后来转发全军。可对比一下杨成武当时对于张爱萍的一些做法。

打倒罗瑞卿后，杨成武又以“同罗关系密切，批罗不积极，态度不好”等罪名，下令“火烧”（后上升为打倒）张爱萍。一九六六年五月，听传达中央关于批判彭真会议精神时，张对有些人的发言持有不同看法，杨成武知道后，把邱会作、罗舜初、雷英夫找到家中，授意他们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攻击张爱萍。总参开展“四大”后，杨成武又授意雷英夫把报告抄成大字报贴在旃坛寺。一九六七年三月，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斗张爱萍，把张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误思潮的看不惯，说成“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张对杨成武有意见，说成“不尊重”，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总参党委写的情况报告中说：张爱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是罗瑞卿篡军反党的得力帮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王新亭主持会议，吹捧杨成武一贯正确，说：要紧跟杨代总长，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如果说这是拍马屁的话，这个马屁是拍定了。同年杨成武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张爱萍是个假党员。”这一年的十二月，总参党委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杨又宣布：“张爱萍不仅是假党员，而且是特务”。（《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11.02）

文革期间彭德怀专案组也隶属于中央二办之下。但在此之前，却是独立的，当时是由贺龙等人主持。1963年11月—1964年1月，彭德怀专案办公室写出《关于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该报告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孙立忠，《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湘潮》2009年第2期）而在1970年11月的专案审查小组报告中却把死刑予以免除，代之以“判处无期徒刑”，这无可避免的仍然带有文革专政的特征，但也是一小进步。黄永胜对此报告批示“同意”上报。（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 六：传奇上将许世友

《军人永胜》一书附录四是迟泽厚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其中透露了一位开国上将的“事迹”。迟泽厚写道：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页601—602）

知情人透露，许世友还是1975年年底率先向毛泽东进言要求批邓的几个人之一。许世

友的功夫不仅体现在告密上，更体现在整人上。南京大学董国强教授曾经以江苏南京为例，详细论述了许世友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机会大整原来对立面的过程。（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七十期，2008年1月31日）许世友不仅利用整“五一六”造成冤魂无数，更应该为著名的蔡铁根大校冤案一事负责。蔡铁根的儿子后来在回忆其父的文章中发出怒吼：我们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而许世友这个毛泽东的走狗、老王八蛋，是罪魁祸首！（蔡铁根，《蔡铁根长子叙述蔡铁根平反经过》，未删节版）

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拒不承认其在中美会谈中对美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决定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许世友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被召来参加这次批斗。在批斗会现场，许世友在椅子上不安分的跳上跳下，用手指着周说：告诉你，总理，如果苏修打进来，美帝打进来，你如果想要做儿皇帝，我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允许你的，不会放过你的。（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1974年1月，许世友在江青的支持下，对原广州军区的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揭批”。许世友拉上赵紫阳，接见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广州地方两派群众组织的33名头头，宣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党，要这些头头与他“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揭，我们在军队揭”。许世友频频在大会、小会、军内、军外讲，广州军区的问题“不简单”，过去被“捂了盖子”，现在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于是，运动迅速升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问题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随着材料越揭越玄，破绽越来越多，中央终于看不下去。北京在7月29日发来紧急电报指名批评了许世友，并派韦国清来处理善后。广州军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戛然而止。（迟泽厚，《人间自由真情在一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4期）

许世友的这些功夫确实够传奇的！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